

理论动态 287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

1981年7月5日

认真学习《决议》，团结一致向前看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取得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成就。一是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是改选和增选了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这两件大事，必将更有力量地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进一步的贯彻执行。这次会议，将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从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已经有了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四五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清了从党成立到抗日战争前这段时期的重大历史是非，系统总结了党领导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这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一九四二年，在通过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前三年，当开始着手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学习组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他还指出，搞清历史，“这对于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毛泽东同志这段话的意思十分清楚，总结过去，是为了指导当前。一九四五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实现了这样的历史作用。可以预期，今天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一定能够实现这样的历史作用。两个《决议》的历史条件不同，党所处的地位不同。前一个《决议》，开始只公布于党内的较小范围；而这次的《决议》，则直接同全党和党外群众见面，它实际上涉及党的六十年，并着重对我党执政以来三十二年极端复杂的历史作了全面的总结。它的公布，不仅将促进全党认识的统一，而且将帮助广大人民

群众正确认识党的历史。它不仅对国内，而且也将在国际上产生极大的影响。

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创建了光辉灿烂的业绩，也走了曲折的道路；既有成功的丰富经验，也有失败的深刻教训。不同的经历和处境，使人们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产生了认识上的差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解决了一大批历史遗留问题，恢复、增强了党的团结，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对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进行系统的总结。它在某种程度上妨碍着全党认识的统一。而没有这种认识的统一，我们要继续前进是困难的。这是在当前历史转折关头需要解决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我们党能不能在目前作出这样的决议，国内外都有人表示怀疑。现在，事实打破了这种疑虑。《决议》的公布向全世界表明，我们的党是团结一致的，是有能力驾驭全局的，它必将在《决议》的基础上形成更加巩固的团结，统率全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强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为达到全党一致所要解决的首要的、第一位的问题，是应当怎样看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毛泽东思想是经过长期历史检验的科学理论。毛泽东同志虽然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就一生来看，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为中国革命事业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将永远铭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在晚年，他犯了错

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正象《决议》所指出的，他主观上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的思想之所以陷入错误，正是由于它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因此，这里弄清思想的关键，是要对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功绩和他晚年的错误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既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伟大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作用；也不能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一切照抄照搬，甚至坚持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错误观点、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搞“两个凡是”。这就是说，必须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严格区别开来，而决不能加以混淆。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作出的历史抉择。今后，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新结论，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为达到全党一致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应当怎样看待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成绩和错误。

党在建国以来的工作中，的确发生过不少错误，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期性的错误。但是，更重要的是必须看到，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建国后的前七年，我

们出色地、成功地实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是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办事，是完全符合人民要求的。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尽管党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错误，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但是，我们在缺乏经验、遭到挫折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不应当掩饰错误，否则，将妨碍我们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甚至导致错误的重犯。但是，更不应当否定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正如《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

《决议》对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工作，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工作，作出了正确的估价。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坚决果断地进行拨乱反正，纠正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真正实现了历史的转折，从而也为这次《决议》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三中全会，就不会有象今天这样的全党团结统一的局面，也就不可能形成今天这样的《决议》。

以上这些，就是全党经过对三十二年的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得出的最基本的结论。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自觉地在这个《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把现代化建设搞好。大家都应当有这样一个自觉性，就是

《决议》一经通过，就不应当再纠缠历史旧账。大家都应当向前看，不应当再向后看。纠缠历史旧账，只能抵消我们的力量，涣散人们的斗志，影响我们集中精力搞建设，不利于团结，不利于大局。

历史总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前进的，革命的历史也是这样。对待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首先要看它们（或他们）所供给历史的新东西、新贡献。要看主流，看主要方面是否是历史前进中的一环，是对历史起促进作用，还是起促退作用。否则，将不可能作出是非功过的正确判断。所谓对历史“宜粗不宜细”，这决不是在某种困难面前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条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一般原则。所谓“粗”，这里是指一种历史眼光，从历史条件看问题，从历史发展总体看问题，而不夸大其中的一枝一节；看一个历史人物的作用，要看他一生的主流方面，看他是否对历史提供了新的东西，从而作出历史的公平比较。眼光狭窄，只看到眼前事变，不顾历史全局，或者因为自己亲历其境，涉及到个人遭遇和个人恩怨而感情用事，这样，是不足以评论一个历史人物的，就是说，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们反对纠缠历史，这当然不是说，对于历史上的问题，今后就不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从思想上、理论上继续辨明是非了。我们说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也不是说在实际工作中就不需要继续拨乱反正了。《决议》集中了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的伟大成果；它的公布，又为进一步

在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和探索新问题提供了新的精神武器。它将在全党推动一个新的学习运动。办法是要将《决议》的学习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结合起来，同总结各个方面经验经验和各个人的经验结合起来。

人们创造历史的能力要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到提高。我们中国人历来有总结历史经验的传统。共产党人更加应当有总结历史经验并从中得到教益的自觉性。我们是在十亿人口的大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利用。我们自己的无论是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经验，如果能加以正确的总结，都将是宝贵的财富。因此，总结经验决不只是为了消除分歧，而是我们积极创造历史的一种动力。

同时，在一个时代，一个历史时期，指导人们前进的精神武器，不应当仅仅限于前人创造的理论成果，而且应当包括这一代人在继承运用这些成果时所作出的新贡献，包括这一代人加进这个精神宝库中的新东西。二十世纪初，列宁曾向无产阶级文学工作者提出，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要使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经验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的这个要求，不仅适用于文学工作，也是向无产阶级政党提出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下，不断总结革命实践的新鲜经验，并把它上升为理论，又反过来指导新的实践。

实际斗争的具体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当它们还没有上升为理论的时候，至多只能对人的行动起借鉴的作用，只能告诉人们，应当这样做，不应当那样做。只有把这种经验上升为理论，从中找出规律性的时候，才能提供给人们以科学的方法，对人们的行动起指导作用，才能告诉人们，为什么应当这样做，为什么不应当那样做。我们应当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用这种方法来总结自己的工作，把已经总结的历史经验（包括《决议》在内），同我们亲身经历的实践经验紧密结合起来，并把它变成“活的行动理论”（恩格斯语），使之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生气勃勃的指导作用。

当前，在我们党内，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特别是“左”的思想的影响。《决议》总结的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的工作之所以产生失误甚至受到严重的挫折，主要是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造成的。“左”的东西在我党历史上渊源很深，持续时间很久，影响面很广，在一些同志身上，它已经成为了一种顽强的习惯势力。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步履艰难，徘徊前进，都和“左”的思想的阻挠分不开。今天，我们如果不下大决心、花大气力在实际工作中彻底拨乱反正，去掉“左”的东西，那么，党的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前进，甚至可能重蹈覆辙，再犯新的错误。

列宁说：“不要满足于我们从以往的经验中获得的本领，一定要前进，一定要争取更多的东西”。（《列宁选集》第3卷

第613页)温故为了知新。我们应当通过《决议》的学习，把精力更加集中到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上来，争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胜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在两年多的实践中，它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些，都在这次的《决议》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经过调整的中央领导机构，它不仅包括早已成为我们党的核心力量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在今天仍然起着必不可少的核心作用，而且包括一批久经考验的、比较年富力强的中坚骨干，近几年，他们一直战斗在中央领导工作的第一线，又经受了新的锻炼。只要我们在《决议》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在党中央的周围团结一致，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和障碍，在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稳步向前。